

# 地缘政治视角下的1904年英印政府侵藏缘由探析

刘财富

(四川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四川 成都 610064)

**【摘要】**1904年英印政府发动了侵略中国西藏的战争,从地缘政治视角看,主要是与清朝忽视中央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的关系,与沙俄侵略西藏对英印政府构成威胁,特别是和寇松之英印政府的“前进政策”有关。

**【关键词】**地缘政治;1904年;英印政府;侵藏

**【中图分类号】**K257.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883(2008)02-0095-04

## 一 近代西方地缘政治学说的兴起及发展

地缘政治学,是近代西方在地理学基础上产生的一种国际政治学理论。其理论核心是突出地理与政治之间的关系,从地理决定论原则出发规定国家外交政策的可能性和优先权,它将地理要素和政治格局的地域形式结合起来,并综合考虑地理位置、国土面积、人口、民族(种族)、资源、经济实力、战略空间等,用以指导国家对外的政治决策和政治行为。

1897年,德国人拉策尔(Ratzel Friedrich, 1844~1904年)发表《政治地理学》,首次提出政治地理学概念,把一个国家作为一个空间现象来描述,这就是他后来“生存空间论”的基础。“一个国家像生物有机体一样,有生、盛、衰的过程……国家必然为生存空间和资源而斗争……国家向外扩张是强盛有活力的表现,是自然而合理的”,这是为崛起中的德国挑战既存的国际格局寻求理论支撑。

1901年,瑞典人契伦(Kjelleen Johan Rudolf, 1864~1922年)在其著作《科学的政治学》中首次提出“地缘政治学”概念,并逐渐完善他的“国家有机体”理论,“明确地将国家比作具有最高生命表现形式的人……一个国家领土的大小,则是该国能否成为一个强国的潜在力量指标……大国的本质,在于与其它大国的竞争中力图获取更强大力量的国家意志,因为战争是对国家全部力量进行的总合”。契伦鼓吹战争合法的理论,迎合了部分西方大国争霸世界的军事行动。

地缘政治学后来有较大的发展,美国人马汉(Manhan Alfred Thayer, 1840~1914年)鉴于美国远离欧洲和其国力上升的现实提出“海权说”：“国家对海洋应有强有力的控制权,只有建立强大的海军,才能实现国家的海上霸权……以巴拿马和苏伊士运河为界的北半球因其贸易和政治活动,应为世界力量的中心;从中国到地中海的广阔地带是争执中

的和可争执的中间地带”;英国人麦金德(Mackinder Halford John, 1861—1947年)更为不列颠帝国的殖民扩张寻求合理化的理论依据,提出“陆权论”,因为只有海上霸权的英国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获取领先其它大国的陆上霸权。“世界历史就是陆上国家与海上国家反复斗争的确历史……交通运输和武器的发展,陆权已优于海权……东欧是心脏地带,谁统治了心脏地带谁就统治了世界岛,也就统治了整个世界……在大陆国家间必须建立缓冲国”。

反观这些理论,它是在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在几百年的发展后,西方各大国凭借其强大的经济军事实力分割世界殖民落后地区的大背景下产生的,也为近代西方殖民东方的不耻行为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近代中国西藏就是这种理论及大国间竞霸的受害者,下文拟作些探索。

## 二 英国的侵略及印藏间地缘缓冲带的消失

中国与印度并不像今天这样,有着漫长的边境线。即便在印度莫卧儿王朝最强盛时期,两国间也被喜马拉雅山脉及山麓的众多清(藏)属藩国、土邦、部落隔开。这些藩国、土邦、部落深受藏文化和中国文化的影响,心向经济文化发展水平更高的中原王朝,它们所处的地域有力地屏障着中国西藏的安全,起到了与南亚次大陆各国在地缘上的缓冲作用。但当历史的车轮前行到十九世纪时,大清王朝国力已大不如前。早在乾隆晚期,乾隆就多次谕示驻藏大臣“只可行所无事,不必过问”藏外各部,对事关西南半壁江山社稷安危的藏事已渐取保守主义的方针。然而近代西方资本主义经济的兴起和最先完成工业革命的英国在南亚次大陆的侵略步伐,打破了雪域高原上圣地的宁静,因为资本追逐利润最大化的本质决定了它不允许世界上有一块游离于资本主义商品经济之外的世外桃源存在。

1600年成立的英国东印度公司,是英国殖民南亚次大陆的工具。当它在印度洋占稳脚跟后,随及

开始了蚕食南亚次大陆的步伐,与此侵略行为同步进行的便是开始向中国西南边疆的这些藩属、土邦、部落实行诱惑、渗透、侵略和占领。为了遏制尼泊尔王国的扩张势头,1814年英印向尼泊尔宣战,占领尼泊尔1/3的国土,有了一个向喜马拉雅山窥探的桥头堡。1826年英属孟加拉政府占领缅甸阿萨姆。1835年英国租得哲孟雄(锡金)大吉岭地区,作为东印度公司的“避暑地”,自此得到一块由印度北侵喜马拉雅山的根据地。1846年强占原本属于西藏阿里三围的拉达克(今天以列城为中心的克什米尔地区)。1861年英控制了哲孟雄的内政外交,1865年英控制布鲁克巴(不丹)。在1890年签署的《中英会议藏印条约》中,英国强迫清中央政府承认“哲孟雄由英国一国保护督理……除由英国经理准行之事外,概不得与无论何国交涉往来”,彻底打开了通向中国西藏的大门。当英属印度图谋中国藩属时,清中央政府采取不闻不问的态度,这种自我封闭意识给后来的西藏带来灾难性的恶果。

面对英国在西南边疆的咄咄逼人之势,清中央政府采取对英退让策略并极力打压西藏地方的抗英斗争,力图避免与英属印度政府的正面冲突。1886年,英印政府根据《烟台条约》派遣马可蕾(Macaulay)使团强行入藏,边境战争有一触即发之势。力微势弱的清中央政府只有对英妥协,迫不得已时出此“丢缅甸保藏”策略,在满足英占全缅甸的同时只获得了英方暂不入藏的口头保证,“中国允英国在缅甸现时所秉一切政权,均听其便……烟台条约另议专条派员入藏一事,现因中国察看情形,诸多窒碍,英国允即停止。在英国欲在藏、印边界议办通商,应由中国体察情形,设法劝导。振兴商务如果可行,再行妥议章程;倘多窒碍难行,英国亦不催问”。

由于清中央政府在西南边疆政策上的失败,导致藩篱尽拆,西藏与英属印度在地缘上的缓冲区即不复存在。如果没有俄国与英国在中亚的大博弈,以当时中央政府的软弱和西藏地方政府的封闭落后,这场大博弈中的最后一环——西藏,难免不会成为英国殖民地。

### 三 西藏在英俄竞霸下的地缘政治劣势

俄国是近代世界历史上另一个侵略成性的国家,从十六世纪开始,历代沙皇便推行“对外扩张,寻找出海口”的政策,对出产黄金的中国西藏兴趣甚浓。1721年彼得大帝就下诏,“要与中国的赛里木城(青海西宁)、达巴城(西宁多坝)及达赖住地,亦应有商务往来……派出机敏人员一起活动,探访

何地出产黄金,产量如何,欲往其它何路可通,即便路甚艰险,亦须查明能否到达其地,并加以占领”。

十九世纪,英俄两国为了争夺对亚洲腹地及远东的控制,在黑海(时属土耳其)、波斯(伊朗)和阿富汗已发生多次武装冲突。尽管在1853~1855年的克里米亚战争中,英联合法国打败俄国,一定程度上阻断了俄国进入地中海、红海和印度洋的通道。但处于上升期的俄国,并不甘心,处处与英国作对,时时寻机报复,猛烈地向英属印度殖民地周边及远东地区推进。到十九世纪末期,俄国不仅吞并阿富汗、波斯(伊朗)以北和中国新疆以西的所有中亚国家,而且还从其势力核心地区修筑了几条通向新占领地的铁路,尤其是到塔什干的铁路已伸到阿富汗边境地区,直接威胁英属印度的安全。俄国从里海到太平洋的前进势头,尤其是派出有军方背景的人员十多次到藏“探路”,让英国人感到震惊和害怕。

当两个强国在亚洲腹地撞到一起时,地处青藏高原号称世界“第三极”的西藏便成为他们的必争之地,因为谁控制西藏谁就具有高屋建瓴的战略优势。如果英国控制,就会轻易地把它在中国长江中下游的势力范畴连成一片,在帝国主义对中国瓜分中抢得更多的利益。如果俄国控制,它将飞速地进入印度平原进而深入印度洋,这对英属印度来说,将是毁灭性的打击。所以,寻找印度的生存空间、建立印俄间的缓冲地及中间地带,便成为英印政府及宗主国英国政府在南亚次大陆的头等大事。此时的清王朝已走向衰落,早已没有力量来阻挡英俄在亚洲腹地的肆意掠夺和蚕食,能潜在和直接威胁印度安全的便只有强大的推行侵略、扩张政策的俄国。长期以来在封闭环境中生存的西藏,很快就“成为西方要求明确的受害者,而且成为一个轮廓比较清楚和有限制的缓冲带了”。

### 四 寇松与英印政府的“前进政策”

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大英帝国,处于其力量的全盛时期,控制着从南非好望角或埃及苏伊士运河经印度洋至远东一线的所有交通线及战略要地。它与俄国在亚洲的竞争,早已成为亚洲各国对外关系的主旋律。资本追逐最大利益的本性决定了英印政府必须为印度商品寻找市场,因为“一越(印度)边境,即有三百万嗜茶之民族,茶又最适于通过高山而为轻便易运之商品”,所以英国商人强烈要求本国政府迫使清中央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允许输茶入藏,任藏人自由购买”争取地缘政治优势和占领商务先机,使得英印政府志在打通印藏商路,与长江中下游的高路连接起来。早在1774年孟加

拉总督哈斯汀士(Warren Hastings)就派遣波格尔(George Bogle)入藏寻求“与西藏的平等通商关系”,但遭到执行保守主义政策的拉萨当局拒绝。

1894年5月亚东开关后,由于清中央政府在开关的同时就在仁进岗格林卡筑墙,禁止藏人到亚东经商和英国商人北上,“关门颇严,往来者无路票不许出入”,一定程度上阻止了贸易的开展。所以英印商品销售并无多大进展,与英国期望值甚有差距。

1898年出任印度总督的寇松(Curzon),是一位狂势的鼓吹大英帝国应在远东大肆扩张的人物,上任之初即改变英属印度对西藏的传统政策。当他发现清帝国在藏威信已失而俄国利用宗教上的便利条件已渗入西藏时,立即呈报英国政府“打算在印中两国之间建立缓冲国,并把俄国排除在外”,要求实行积极政策,即所谓的与西藏直接交往。1899年秋至1901年夏,寇松三次致信十三达赖喇嘛,除了退回的结局,没有产生任何效果。藏人认为英国“欲入西藏佛地”,是为了达到“违例开端通商游历等”,如果同意他们的做法,就会“烦渎天朝圣聪”,甚至会“使唐古特(西藏)所属人等致受烦劳,实属毫无定止”,况且“藏番情性教道全不相同,实为冰炭”,所以彻底地拒绝了寇松的要求。

当寇松一厢情愿策划与达赖直接交往而空费心力毫无作为之时,一个消息传来,“富于排外性之人物(十三世达赖)方遣特使(德尔智)觐谒俄皇……谋与俄国亲善,意与俄国缔结最友好关系”。英国政府和寇松本人起初对达赖代表德尔智在俄国的所作所为并不在意,因为俄国边境最近处与西藏相隔也有二千多公里,它不可能像英国那样对西藏施加影响。其实,俄国只希望通过宗教能对西藏地方施加一定的政治影响,最理想的结局就是西藏不倒向英人的怀抱,它不可能像英国那样为了实现其政治利益和抢得地缘先权而直接出兵。西藏联俄抗英始于1888年隆吐山抗战的失败,由于得不到中央政府的支持,转而寻求其它可以借助的力量。在达赖侍讲经师德尔智的诱惑下,西藏地方认为“我等与其同有仇之英国议和,莫若与无仇之俄人通好”,因为“俄人前次来藏,我等备礼劝阻,俄人立即退去颇讲情理”,开始了联俄抗英之路。德尔智使俄,是俄国利用俄属布里亚特(Buriat)蒙古人德尔智(Dorjjeff,俄国间谍)影响达赖,使十三世达赖喇嘛错误地认为只有俄国才是“唯一强国能破英国阴谋者”的结果。尽管这样,但俄国因素仍让无助的寇松找到了报复西藏的借口和机会。

1901年在色拉寺学经的日本僧人河口慧海向英国提供了一份情报,“西藏正从俄国接受军事援助,包括小型武器、子弹和其它东西”。当时在大吉岭避难的康有为也向英方透露了一个并不存在的传言,中俄间签有共同保护西藏的密约,大清国若遇国家危机,俄国应尽力为之保护,条件是将西藏权利让与俄国。所有这些,似乎让英印总督寇松找到了充分的材料和证据来寻求英国政府支持他侵略西藏的计划。因为在英属印度政府看来,一旦俄国占有或控制西藏,对印度的威胁便是直接和现实的。1903年1月8日,寇松迫不及待地以英印政府的名义向英帝国政府呈递一份报告,就明确地提出“国家生存的首要法则即自谋保存的法规……任何国家、政府或帝国都有权保护自己的利益。倘该利益受到严重危害,如同我们在西藏那样——由于新近(西藏)和另一强国(俄国)进行了维护我们的安排……迫使我们采取行动以逃避这些祸害,而把我们的安全置于有保障和不能动摇的基础上”,建议英国政府向西藏派遣武装使团。这就是英帝国殖民者以防范俄国占领地缘先机为名,而图谋中国西藏为实的前进政策,其目的是赢取印度(英帝国远东殖民体系)的生存空间,确保英皇王冠上最亮的明珠的安全。英国的政治家们,为了长久稳定地榨取来自南亚次大陆的经济利益,根据印度的地理特点和周边环境,从地缘政治学说出发,提出了拱卫印度安全的三个缓冲区,第一个就是英国管理下的西藏,保证不受中国(俄国)威胁。

1903年初,英俄两国在西藏的竞争已达白热化程度,在荣赫鹏(Younghusband)、麦克唐纳少将(General Macdonald)率领武装“使团”越过边境以谈判为名从春丕北上时,俄国向英国提出强烈抗议:“俄政府认为英国此次远征,或将发生异常严重之局势,因而迫令俄当局采取一切手段以保护该处俄人之利益”,在得到英国保证无条件确认过去的声明,即英国不打算侵占这一地区后,这样的政治误会才消除。11月6日,英国乘日俄战云密布、俄国无力干涉英国侵藏的有利时机,正式批准寇松武装入侵中国西藏的计划,“陛下政府认为不能不采取行动,因为它批准使团向江孜推进”。寇松的这一前进政策在荣赫鹏和麦克唐纳少将对西藏人民的屠杀中完成了,西藏在英俄竞霸的大格局下成为英国利益独享地。

近代西方殖民大国对东方的侵略和竞斗,并不是始终如一的。随着德国的崛起,在共同的现实威胁面前,英俄两国开始调整各自的殖民政策,在中

国西藏问题上双方放弃了曾经的白热化争斗,开始相互妥协,这也是清末中央政府在外交谈判上力争西藏主权的成果。1907年英俄两国在亚洲达成一系列谅解,找到了彼此在西藏的平衡点,那就是“尊重西藏领土之完整,相约不干涉其内政……如不得中国政府之中介,不得与西藏缔结任何条约”,用条约的形式承认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

1904年英印政府总督寇松策划的武装侵藏军事行动,既是英俄竞霸亚洲腹地也是清中央政府边

疆政策失败造成的恶果,但其地缘政治因素是首位的。尽管英国用强盗行径强迫西藏地方签订中国在藏主权丧尽的《拉萨条约》,但并没有得到清中央政府和国际社会的承认,因为自蒙元以来西藏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个事实是任何外来势力无法撼动的。此次侵略行为,反而让清中央政府意识到不改变既往的藏事策略,从消极转向积极,西藏完全有可能丢失,这就是后来清中央政府在西藏力推“新政”的肇因。

注释及参考文献:

[1][2][3][4] 刘雪莲.地缘政治学[M].吉林大学出版社,2002.  
 [5] 黄玉生、车明怀.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史[M].西藏人民出版社,1995.  
 [6] 林承节.殖民主义史·南亚卷[M].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7] [8][26]褚德新、梁德.中外约章汇要(1689—1949)[M],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1.  
 [9] 牛治富.论英国第二次侵藏战争爆发的地缘政治因素及其在当今的影响[J].西藏民族学院学报(哲社版),2005,1.  
 [10](英)黎吉生(H·E·Richarson).西藏简史[M].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1979.  
 [11][12] [14][16][18][23](英)荣赫鹏著、孙煦初译.英国侵略西藏史[M].西藏社会科学院资料情报研究所,1983.  
 [13](日)山县初男.西藏通览[M].香港:华文书局股份有限公司,1969.  
 [15] [17]吴丰培.清季筹藏奏牍[M.第一册,《文硕奏牍》卷二;第二册,《升泰奏牍》卷二;商务印书馆,1938.  
 [19] 仔本夏格巴·汪秋德丹著,李有义译.西藏政治史[M].1987.  
 [20] 陈庆英、高淑芬.西藏通史[M].中州古籍出版社,2003.  
 [21] 许广智.西藏地方近代史[M].西藏人民出版社,2003.  
 [22] 王贵、嘉饶尼玛、唐家卫.西藏历史地位辨[M].民族出版社,1995.  
 [24] 周伟洲.英国、俄国与中国西藏[M].中国藏学出版社,2000.  
 [25](英)外交部档案[Z].全宗第535号第3卷,第29号文件.

## The Geo-political Cause of British Invasion into Tibet in 1904

LIU Cai-fu

(College of History and Culture, Sichuan University, Chengdu, Sichuan 610064)

**Abstract:** In 1904, British colony government in India, launched an aggressive war to Tibet China. Analyzing the cause of invasion through the geo-political angle of view, it was not only that the Qing dynasty ignored consanguineous relation between central government and Tibet local government, but also that British colony government in India, unduly responded potential threaten if Russia invaded into Tibet, especially related to Curzon's "Marching Policy".

**Key words:** Geo-politics; in1904; British Colony Government in India; Invasion into Tibet

(责任编辑:李 进)